

# 宋庆龄、第三势力与“五一口号”

朱玖琳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 201103）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

**摘要：**1948 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中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使“五一口号”在全国各阶层中激起强烈反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宪政运动中，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尽快结束国民党的一党训政，第三势力就已经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斡旋，但两次宪政运动皆因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独大的地位而失败。1944 年，中共首次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第三势力于是再次发挥作用，他们依旧希望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1948 年，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中共“五一口号”中的联合政府不再是国民党占主体的联合政府，而是以中共为主体的联合政府。随着形势的变化，第三势力最终完全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宋庆龄虽然对“五一口号”没有书面意见，但她在中共的一再努力争取之下，北上参加新政协，在行动上响应了中共的五一号召。

**关键词：**五一口号；联合政府；宋庆龄；第三势力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 23 条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其中第 5 条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sup>[1]</sup>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使“五一口号”在全国各阶层中激起强烈反响。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面旗帜下，第三势力在国共之间积极斡旋，并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国共之间的势不两立，使第三势力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1948 年中共再次号召成立联合政府时，第三势力反响自然十分强烈。他们对“五一口号”的态度即受原来自身主张的影响，又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有所改变，绝大多数人最终接受了中共的主张。

宋庆龄虽然对“五一口号”本身没有书面意见，但是她在中共的一再努力争取之下，北上参加新政协，与中共共商国是，这种行动上的支持比书面意见作用更大。

## 一、联合政府口号提出的背景

1944 年 4 月至 12 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先后共投入 100 万兵力对抗，结果豫湘桂大溃败使其兵力大为削弱。毛泽东从战役开始阶段就预见到这一结果。5 月 25 日洛阳失陷后，6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城市工作专题会上提出日寇的大规模进攻势必造成国民党大大削弱，未来要对日反攻收复大城市，共产党应争取起到决定作用，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sup>[2]</sup><sup>13</sup>8 月 7 日衡阳失守后，17 日，毛泽东在董必武请示国民参政会的有关事宜来电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sup>[3]</sup>与各民主党派沟通的结果是，各民主党派不赞成中共以自己的名义正式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因为这样会导致他们不便表态。为照顾各党派的政治处境，9 月 15 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的经过，最后“顺便”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sup>[2]</sup><sup>29</sup>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首次公开提了出来。

在这之前，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最著名的政治口号就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

这是他们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早在 1939 年 9 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就和中共参政员一起，向大会提出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尽快结束一党训政，实施宪政。针对孔庚等 52 人、陈绍禹（王明）等 26 人、左舜生等 36 人、江恒源等 40 人、张申府等 21 人、王造时等 37 人，分别提出的请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七项提案，大会进行了合并审查，经大会一致通过，治本的办法是：“（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进宪政。”<sup>[4]</sup>随后，宪政期成会成立，经会员多次讨论，提出五五宪草修正草案。但是，由于修正草案不可避免地妨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为蒋介石所不容。1940 年 4 月 10 日，国民参政会第五次会议闭幕，蒋介石致大会休会词宣布政府继续抗战之决心，“此项宣布既系全国最高当局所发，必使国内外所传中政府可能的改变政策之种种谣诼，自动消灭”。“修改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所颁宪法草案之动议，已告失败；并有提议在本届参政会结束后及国民大会召开前应设国民政委会者，此项动议经热烈讨论，亦被否决。”<sup>[5]</sup>第一次宪政运动遂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随后于 1943 年 9 月也提出宪政运动。9 月 8 日，国民党五届十一次全会通过《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重新提出筹备国民大会，决议：“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sup>[6]</sup>宪政实施协进会于 11 月成立，蒋介石是会长，民盟主席张澜被私下除名。1944 年 3 月 5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宪政运动时说：“国民党现又提出宪政运动，是为了取得民主的政治资本来掩护党治，对付我们，束缚我们。”<sup>[7]</sup>此次宪政运动仅限于清谈，基本上是画饼充饥，中共也在这一运动中被边缘化。

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后，国共谈判内容从不对等的朝野合作转向对等的朝内合作上来。日本突然投降后，在苏方压力下，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承认国民党的法统，表示不提联合政府，以参加政府而妥协。

然而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却遭到西式民主制的猛烈批判。1945 年 12 月 1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马歇尔大使启程赴华前两小时，发表对华声明，直接指出孙中山的训政施策必须修改，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中国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之军队，以及其它持有歧见之武装部队，应设法停止军事冲突，俾达中国全国完全重归中国有效统治之目的，其中包括日军之立即撤退。（二）各主要政治份子代表，共同参加之全国性会议，应谋目前国内纷争之早日解决办法，亦即促中国统一之解决办法。”<sup>[8]</sup>

在美国的压力下，1946 年 1 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对一党制进行了政治清算。但是，正如《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一书作者邓野的结论：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协是以超强的国际背景为依据的，其召开及其结果完全脱离了民国的政治逻辑。所以，政协会议一个月之后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过来又对政协会议进行了政治清算。<sup>[2]461</sup>

最后，东北问题演变成国共全面内战。战争进行到 1948 年，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据战场优势。于是，“五一口号”所说的联合政府不再是国民党占主体的联合政府，而是以中共为主体的联合政府。这一目标是毛泽东早在 1945 年 4 月 24 日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设定了的：“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sup>[9]1056</sup>也就是说要在未来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 二、第三势力对联合政府口号的态度

1944 年 9 月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为第三方面力量提供了一个能够起到实际作用的

舞台，他们结束了宪政运动的清谈，转而与中共结成联盟，实实在在地投入到眼前的民主谋划中。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从而与中共建立起统一战线。在1946年1月的政协会议中，第三势力与中共一起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当时的方案完全是针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而设计的，于是1948年中共再次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后，第三势力在普遍响应中共号召，拥护建立联合政府的同时，又顺势而为地受到1946年政协精神的影响，想要限制共产党在未来联合政府中一党独大的地位。

以民革为例，1948年6月25日，为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民革发表声明，开篇便强调：“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讨伐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曹吴既倒，孙先生随即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建议；并主张于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先举行包括‘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各政党’的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并提出：“中国共产党于五一劳动节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诚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这一建议完全符合二十四年前孙先生所提出的预备会议和国民会议的精神，亦为本会行动纲领所明白规定”。<sup>[10]</sup>民革赞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同时也暗示这一口号非中共独有。民革中有人仍然希望在未来的联合政府中走以国民党为主体的道路。就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7月16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评价说：

民革有如李济深将军、冯玉祥将军以及蔡廷锴将军这样著名的杰出首领，其个人影响可望获得极多的军事支持者。如果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政府，这一集团的最基本方案是要求耕者有其田，立即停战，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中共目前的政策相符合。并且，民革不仅与十分活跃的香港中共代表及广东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而且据称也基本上理解中共领袖人物的主张。不过，李将军及他的某些随员坚持说他们的目标基本上是反共的，现在的联合仅系一种必要的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其方案仅仅是为了能够获取当今中国广泛的民心支持。<sup>[11] 236-237</sup>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明确说：“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sup>[9]1375</sup>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当日，蒋介石宣告“引退”。次日，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及民主人士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意见，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sup>[12]</sup>

### 三、宋庆龄的反应

关于国民党一党训政，宋庆龄早就间接提出过批判。1929年8月10日，宋庆龄在驳斥戴季陶时说：“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著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的呢？”<sup>[13]78-79</sup>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道路上，宋庆龄起初的活动基本上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进行，她甚至曾宣布“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sup>[13]83</sup>。

随着形势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国民党的

态度，从坚持世界革命到促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抗日讨蒋到联蒋抗日。宋庆龄也转而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

1944年9月，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第三势力积极支持，对此，蒋采取了打压政策。宋庆龄对此十分不满，1945年5月3日，她在同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和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H·费德林就中国的民主运动谈话时说，她认为建立联合政府是“当前政局的唯一出路”<sup>[14]212</sup>。

虽然宋庆龄清楚地认识到国共之间势不两立，因而曾在1945年2月17日给史迪威副官杨孟东的信中抱怨道：“CP不会愿意把他们的军队置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而KMT又不愿放弃一党专政”<sup>[15]</sup>。在中苏谈判期间，她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明确表示，蒋介石是想借苏联之手来遏制中国共产党，他不可能放弃一党专政，民主人士希望建立联合政府实属幻想。<sup>[14]215</sup>

但是，宋庆龄还是希望国共谈判能够成功，多党制的联合政府能够建立。她是国民党创始人的遗孀，虽然明知联合政府成立的希望渺茫，但她仍然不放弃幻想，从她的角度去考虑，她有这样的幻想是很正常的。重庆谈判期间，她对两党谈判结果持乐观态度。8月29日，她对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表示：“建立联合政府并非不可能。”<sup>[14]217</sup>抗日战争胜利，宋庆龄在回到上海后不久，曾致函金仲华，告诉他自己已不打算住回莫利爱路寓所，准备把它捐给国家，并提供国共两党作谈判之用。她说：“也许孙先生的精神会推动他们实现真正的统一和民主。”<sup>[16]</sup>

然而，再次让宋庆龄失望的是，国共停战协定迅速成为一纸虚文。全面内战爆发后，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公开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她提出：“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了。”“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出来，而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派。”“代表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以后，应当让他们起草一个为中国人民所承认和批准的宪法。让这些代表在宪法中写明，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这些自由绝不能听凭少数野心家的一时好恶来决定，而是完全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的。”<sup>[13]416</sup>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共产党和民盟缺席的情况下在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次年元旦，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定于是年12月25日施行。自此中华民国从表面上结束训政时代，正式进入宪政时代。但是，制宪国民大会将共产党和民盟排斥在外，所制定的宪法必然遭到共产党的强烈反对。1947年9月16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的声明》，谓：“我并无任何从事政治运动以图参加（蒋）政府的意图。”<sup>[13]437</sup>

宋庆龄始终没有对中共发出的“五一口号”公开表示过意见。“五一口号”发出不久，5月21日，美联社记者罗伯特·A·伯顿给宋庆龄写信道：“我想对你进行一次采访，目的是澄清莫里斯·科恩私下透露的关于目前中国政府和它同你及李宗仁将军的关系的消息。科恩将军暗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广泛的变动，涉及到你、李宗仁将军以及现政府。”<sup>[17]148</sup>宋庆龄拒绝接受采访，其秘书回复伯顿道：“对于你信中提到的科恩先生据说给了你有关她的消息，孙夫人感到十分惊讶。另外，关于你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广泛的变动’，涉及到她及现政府的其他人，孙夫人对此事一无所知。”“孙夫人希望大家知道她全身心地只致力于福利工作。”<sup>[17]150</sup>

但事实上，宋庆龄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游离政治之外，反而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1948年4月17日，司徒雷登引用蔡廷锴的话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

蔡廷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极有把握地宣称，宋子文在最近的谈话中告诉李（济深）将军，政府有可能在大约3个月内崩溃，并表示随着蒋失去权力，政府希望立刻

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蔡还宣称，孙逸仙夫人正积极为国民党工作，并在军队、政治和教育各界获得广泛支持。蔡暗示李济深希望在6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宋的估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最近访问广东时，宋没有表明他感到政府崩溃在即。但是，他声明他最近见到蔡廷锴，他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会与他合作。<sup>[11]189-190</sup>

司徒雷登报告所谓“孙逸仙夫人正积极为国民党工作”，也是同民革密切相关的。李济深为成立民革，获取宋庆龄的支持，曾于1946年年底，在祝世康、卢季卿夫妇陪同下，在上海新雅饭店密会宋庆龄。席间，李走向宋身边耳语，说他要成立民革，请宋带头。宋答，她不能带头，且不带头比带头更好，应由李带头，但不能在上海成立，赶快到香港去成立。<sup>[18]</sup>李赴香港成立民革后，当宋庆龄得知国民党打算派特务去谋害李济深，又连忙派人去香港通知李济深。<sup>[19]</sup>李济深后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之下，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sup>[20]</sup>

1949年1月16日，面对即成事实的分裂局面，宋庆龄以沉痛的心情对她的朋友说：“我们中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曾试图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然而历史仍然选择了这条破坏性的道路。”<sup>[21]12</sup>

1949年6月20日，李济深致函宋庆龄，谓：“新政协正积极筹备，近期可望召开，济深已提请先生为本届出席代表，咸表钦慰。”<sup>[17]204</sup>希望宋庆龄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协。宋庆龄刚刚于6月4日以“养痾沪滨，暂缓北上”<sup>[21]188</sup>为由，婉拒了李济深等人恳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之电请，对李此函她未作答复。在中共中央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之下，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但她不想以任何团体的名义作为出席新政协的正式代表，因而她要求以旁听身份列席，但是邓颖超希望她能以妇联代表的名义作为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虽经邓多方解释说明，宋不再坚持己见，但她的“请你们替我考虑”的表态说明她对邓颖超的意见还是十分勉强的。<sup>[22]</sup>宋庆龄到京后，经周恩来与她当面商定，她作为无党派人士，以特别邀请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在这次会议上，无党派人士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当选副主席的民主人士还有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N].人民日报,1948-5-2(1).
- [2]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3]逢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36.
- [4]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讨论各案 通过建议案七十七件临时动议五件 以川康建设方案及制宪案为最重要[N].申报,1939-9-19(7).
- [5]国民参政会重要后果[N].申报,1940-4-12(4).
- [6]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844.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572.
- [8]杜鲁门声明美对华政策[N].申报,1945-12-17(1).
-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16.

- [11] [美]雷(Rea, K.W.),[美]布鲁尔(Brewer, J.C.).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M]. 尤存,牛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 [12]李济琛沈钧儒等五十余民主人士抵达解放区 声明彻底支持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 希望全国人民共同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N].人民日报,1949-1-24(1).
- [13]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14]李玉贞.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M]//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2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15]宋庆龄.宋庆龄书信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9.
- [16]宋庆龄 1945 年底致金仲华函复制件[B].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宋庆龄纪念馆.
- [17]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18]祝文光.父亲祝世康秘密宴请宋庆龄李济深[J].世纪,2009(6):8-10.
- [19]祝世康.峥嵘岁月忆深情[N].文汇报,1981-6-5(3).
- [20]李沛金.李济深, 香港脱险记[J].东西南北,2011(4):69.
- [21]宋庆龄.宋庆龄书信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47—51.
- [23]朱玖琳.中共邀请宋庆龄北上揭秘[J].世纪,2009(3):4-8.

**作者简介:** 朱玖琳(1969-),女,上海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